



The Other as the Self

—On Tsurukawa and Kashiwagi as Self-Projections of Mizoguchi in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Xingyi Xiao, Wei Qi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China
Email: 13985457495@163.com

How to cite this paper: Xiao, X.Y. and Qian, W. (2026) The Other as the Self.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13: e15370.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5370>

Received: April 18, 2026

Accepted: May 19, 2026

Published: May 22, 2026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In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the characters of Tsurukawa and Kashiwagi hold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tagonist Mizoguchi, serving as illustrations of Freud's tripartite structure (id, ego, superego) and the mechanism of projection: the former represents Mizoguchi's superego projection of goodness, equality, and moral ideals, while the latter embodies his id projection of evil and instinctual desires. Neither is an independent other; rather, both are mirrors of Mizoguchi's split personality. From relying on the superego to perform goodness, to actively allying with the id and accepting instinctual desires, and finally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uperego with Tsurukawa's death, Mizoguchi's spiritual trajectory reveals the individual's spiritual dilemma torn between morality and desire, demonstrating the profound depth of psychoanalytic expression in Japanese literature.

Subject Areas

Culture

Keywords

The Other, Self-Projection,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Psychoanalysis

1. 引言

日本社会由多元素形式构成，社会结构呈复合型，基本上是一个开放性社会，不具备封闭的性格，对外来文化包括外来文学及其思想具有巨大的包容力。明治维新以后，精神分析也同其它各种西方思潮一样传入日本。较早的如厨川白村关于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理论，有岛武郎强调人的本能欲望并在其创造中得到体现，20世纪一十年代兴起的唯美主义、二十年代兴起的新

感觉派都受到了精神分析深刻的影响[1]，“跟踵而至的三十年代初‘新兴艺术派俱乐部’舟桥圣一等作家对变态心理的描写，乃至稍后出现在丹羽文雄笔下的那些明显表现恋母情结和性本能的小说……，都从不同侧面透露出日本文学中的精神分析色调。”[2]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正是突出的例子。

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3]。本我承载原始欲望与本能冲动，遵循快乐原则；超我代表道德理想与社会规范，遵循至善原则；自我则在二者间寻求平衡、调停冲突。投射是个体将自身无法接纳的心理内容转移到外部他者身上的心理防御机制，用以缓解内在矛盾与痛苦。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本文中的“他者”特指作为人物形象的鹤川、柏木。本文所用阳面指沟口被道德理想规训的超我面向，暗面指其被压抑的本我欲望与阴暗冲动，真实自我则指沟口未经伪装、直面本能与缺陷的人格内核。鹤川对应阳面一超我投射，柏木对应暗面一本我投射，沟口本人则是在二者间摇摆、调停并最终失衡的自我。

现有有关《金阁寺》的研究多从美与毁灭、社会边缘人、金阁象征意义等角度进行解读，或仅将鹤川、柏木视为沟口的性格对照与伦理选择项，较少从精神分析的投射机制出发，系统论证二者实为沟口人格分裂的镜像载体。基于此，本文核心研究问题为：如何以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与投射理论为框架，证明鹤川、柏木并非独立现实人物，而是沟口超我与本我的外化投射，并以此阐释沟口从压抑到焚毁金阁的完整心理逻辑。下文将依次从超我投射、本我投射、超我崩塌与本我胜利的心理过程展开论述，揭示沟口人格分裂、失衡与极端整合的精神悲剧。

2. 超我投射：鹤川作为沟口的阳面镜像

(一) 平等与道德理想的投射载体

作为口吃、孤僻的边缘人，沟口始终渴望被“正常化”对待，鹤川的出现则为沟口灰暗的生命带来了曙光，他们的初见：“于是鹤川笑了，笑得他白衬衣下的腹部不断起伏，树叶间洒落下来的阳光在他腹部起舞，这一切忽然让我感到很幸福。我的人生就像这件白衬衣一样起了褶皱，但是，即使起了褶皱，这件衬衣仍然如此洁白耀目……或许，我的人生也是一样吗？”([4]: p. 52)这是沟口在书中为数不多的透露出对光明向往的瞬间，而鹤川是引发他感受的起点，其在书中正向的感受也大多与鹤川紧密相连。鹤川还扮演了对沟口的“接纳者”的角色：“鹤川总是喜欢当我情绪的解说者，可惜充满了误解。但我对他完全讨厌不起来，他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他是个真正的善意满满的解读者，能把我的语言解读成世人能听得懂的语言。他是谁也無法替代的好朋友。”([4]: p. 68)在沟口袒露自己对金阁的异常执着之情时，他以为鹤川会像其他人一样表现出焦躁、同情、不耐，但他只说道：“因为我这人，压根儿就不在乎这个呀！”([4]: p. 54)

鹤川主动亲近沟口，耐心“翻译”其扭曲含混的表达，甚至为沟口的孤僻行为赋予善意动机——这种不加评判的理解，正满足着沟口内心深处对“平等”与“道德理想”的极致向往。沟口将自身无法实现的道德理想与生存渴

望，完整投射到鹤川身上，借他的口构建出一个“阳面”的自我，鹤川既是外在他者，更是沟口渴望成为的理想自我，是其超我的外在载体。

值得说明的是，若仅将鹤川视为现实层面的善良友人或伦理对照形象，便难以解释其性格高度理想化、功能单一化的叙事特征——他始终以“光明解读者”的姿态服务于沟口的内心需求，不具备现实人物的复杂与矛盾，更符合精神分析意义上“理想化投射”的建构逻辑。因此，将鹤川理解为沟口超我的外化投射，而非单纯的性格对照，更能贴合文本深层的心理结构。

(二) 伪善的共谋与超我的表演性

沟口对鹤川的依赖，本质是对“伪善”的依赖：“我不止一次说过，鹤川是我内心影像中的阳面。如果他忠于自己的职责的话，就不应该这么逼问我，他应该对我不闻不问，只管将我阴暗的内心感情转化为明亮的、阳光的感情。” ([4]: p. 100) 只要鹤川存在，沟口就能通过这面镜像，自欺欺人地包装自己，成为一个好人。但这种依赖并非源于真正的道德认同，而是一种外在的、借来的“超我”支撑。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自从中学时代在前辈的剑鞘上划下几道难看刀痕起，自己已不具备面对辉煌人生的资格了” ([4]: p. 145)

沟口在鹤川面前刻意维持温和和无害的形象，实则是在进行一场“善的表演”——他并非真正内化了善良的品格，而是通过依附鹤川的“超我”投射，暂时掩盖内心的阴暗与扭曲。这种表演性的生存状态，为后续“超我”的崩塌埋下伏笔。

3. 本我投射：柏木作为沟口的暗面镜像

(一) 绝对的理解者与诉说者

如果说鹤川是沟口的“理想自我”，柏木则是其“真实自我”的具象化。柏木天生跛足，与沟口同样处于社会边缘，却以截然不同的姿态生存：他坦然接纳内心的恶意，也不断地作恶，以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面对世界。初见时，柏木一眼看穿了沟口的伪装，直接与其内心的阴暗面对话：“你肯定觉得今天终于遇上一个可以让你安心结巴的人了，对吧？人都是这样找同伙的。” ([4]: p. 111)

此后在与柏木的相处中，沟口也不断感受到“共鸣”和“被理解”，也坦言与柏木相处比鹤川更舒适，这也是他渐渐认识、接受自己暗面，暗面遮盖阳面的过程。另外，沟口的许多阴暗想法常借柏木之口被表达，“柏木说过”这样类似的表达也贯穿书的中后段，这表明柏木已成为其内心暗面的权威声音，是沟口不敢直面的“本我”的代言人。在柏木面前，沟口无需表演善良，得以暂时释放真实的欲望。

(二) 主动选择与暗面结盟

鹤川与柏木就像是处于一座无法回头的桥的两端，走向一方就意味着同时逐渐远离着另一方。沟口对鹤川的疏远与对柏木的亲昵，是其“自我”的主动抉择。“鹤川并不怎么看好我和柏木的交情，他再三向我提出友情满满的忠告，但我完全听不进去。我还反击道：‘你鹤川可以交到很优秀的朋友，但我这样的人只配结交柏木这样的家伙。’” ([4]: p. 133)

自卑始终笼罩着沟口，他的对美是向往的，但是也认为自己不配得，同样地，美所代表的鹤川，也让他始终感到距离。所以随着与柏木交往的深入，沟口逐渐厌倦了鹤川构建出来的那个“阳面”的他，他也厌倦了“超我”的虚伪表演——鹤川所代表的“善”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柏木所代表的“恶”却因其真实性而具有强大的诱惑。这种选择标志着沟口开始背离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向内在的欲望本能。疏远鹤川，也不是简单的友谊破裂，而是心理上“弑杀”超我投射的第一步：他主动放弃了借来的道德支撑，转而拥抱更符合自身本质的“本我”。

同样需要澄清的是，柏木并非外部意义上“引诱主角堕落”的负面角色。其思想与行为始终与沟口被压抑的本能、阴暗冲动高度同构，其出场与影响完全内嵌于沟口的内心分裂过程，而非由外部现实推动。因此，将柏木视为沟口本我的投射载体，比将其视作独立的现实人物更具阐释力，也更能揭示人物心理的内在统一性。

4. 自我失衡：超我崩塌与本我胜利

(一) 自我的调停与失衡：从压抑到转向本我

作为人格结构的执行者，沟口的“自我”长期在本我欲望与超我规范间艰难调停。超我依托鹤川压制性本能、阴暗冲动，要求沟口维持善良、克制的形象；本我借柏木呼唤欲望释放、恶意宣泄，追求真实与解放。初期自我偏向超我，以“善的表演”维持内心平衡；但现实中边缘处境、金阁的绝对美带来的压迫感，让超我的约束日益虚弱。自我逐渐失去调停能力，开始倒向本我，主动亲近柏木、疏远鹤川，为后续超我崩塌与极端行动铺平道路。

(二) 性的接纳：自我与本我的行为融合

沟口从拒绝女性到接纳娼妓的情节转折，是其人格结构转变的关键仪式。此前，受“金阁寺”“超我”投射的约束：“经常将我远远排斥在外、高高耸立在我的世界之外的金阁，现在完全包围着我，并在它的内部给我预留了一个位置。房东女儿离我远去，渐行渐远，像一粒尘埃消失在空气中。”([4]: p. 146)

沟口长期压抑着自身的性欲望，但为了花掉学费而得以被主持赶出寺庙他最终主动寻找娼妓，完成了身体层面对“本我”欲望的接纳，完成了与柏木在行为上的同化。性的接受，使沟口的“自我”与“本我”实现了融合，进一步削弱了“超我”投射的影响力，推动沟口彻底放弃道德克制。

(三) 鹤川之死——“超我”的彻底崩塌

第九章中柏木携鹤川遗信来访的场景，构成了全书最具戏剧性的转折。在初闻鹤川因为车祸而死时：“认识柏木后，我跟鹤川多少有点疏远了，现在失去他，我更加明白，将我和光明世界关联起来的一缕细丝，随着鹤川的死也断掉了。我的泪其实是为了失去的白昼、失去的光明、失去的夏天而流的。”([4]: p. 149)

沟口认为他与光明世界已经彻底断连了，但笔者认为，即使鹤川的肉体已经消亡，但他在沟口心中构建的“超我”投射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消失，他时常想起鹤川，他从未遗忘。但在此时，看见鹤川在给柏木的信中写道：“现

在想来，我的这段不幸的恋爱，可能是不幸的心理造成的。我生来就心理阴暗，其实我从来不知开心明朗的感情为何物。” ([4]: p. 247)一向阳光的鹤川对自我的解析是“阴暗”，最后更是因庸俗的失恋自杀时，这些事实直接揭露了其“阳光形象”的虚假与脆弱，更是对沟口进行了致命一击——那个被沟口投射了所有美好幻想的超我的具象，本质上是一个同样脆弱、庸俗的普通人，“超我”破碎了。

同时，作者巧妙地为此时的柏木赋予了“报丧者”与“揭秘者”的双重角色，确保鹤川代表的“超我”的死亡信息被沟口准确接收，被“本我”知晓，这一刻，鹤川才彻底死亡。而书中第九章的结尾现场只剩下代表“本我”的柏木与代表“自我”的沟口，也暗示着至此，沟口的人格结构完成了简化与重组，“超我”被彻底瓦解，“本我”与“自我”不断融合直至书的结尾“火烧金阁”。

(三) 从压抑到焚毁：心理链条的内在推进

沟口最终走向焚毁金阁的决断，并非情节的偶然并置，而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心理必然。对性欲的主动接纳，标志自我放弃超我规训，第一次在行为上与本我达成一致；对鹤川的刻意疏远，则是自我主动切断与理想道德世界的联系，让超我失去依托；而鹤川遗信所揭露的虚假性，彻底摧毁超我重建的可能，使沟口再无回到“善的表演”的路径。当超我彻底退场、本我完全占据主导，沟口便只能以焚毁金阁这一极端方式，挣脱绝对美与外在道德的双重束缚，完成人格的病态整合。从压抑欲望到接纳欲望，从依附超我到弑杀超我，再到以毁灭完成自我确认，沟口的每一步心理变化都推动其走向最终的决断。

5. 结语

《金阁寺》中沟口的精神变化历程，本质是其人格的分裂与整合过程。抽象的“三我”结构被具象化为人物关系，使鹤川与柏木成为沟口“超我”与“本我”的外化载体：鹤川承载着他对光明与道德的向往，却是虚伪的崇高；柏木则对应他对真实欲望的认同，是未被驯服的自我本质。从依赖鹤川进行“善的表演”，到主动选择柏木拥抱暗面，沟口的人格轨迹清晰而决绝。性的接纳让他从行为上完成了与本我的融合，鹤川之死及其遗信中的自白，则彻底击碎了超我的虚假镜像，超我的退场也预示着本我的最终胜利，暗面遮盖了阳面。书的结尾，金阁的焚毁，则标志着沟口彻底摒弃外在道德束缚，拥抱内在欲望本质。

在日本文学的精神分析传统中，沟口的角色悲剧具有普遍意义：当个体无法调和道德理想与本能欲望的矛盾，缺乏健康的自我调节能力，便极易走向对虚假的反叛与对真实的极端拥抱。“他者即自我”的投射，最终将沟口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既完成了个体人格的病态整合，也为日本文学中精神分析色调的表达，留下了范例。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1] 陈黎. “三岛热”、精神分析和《金阁寺》[J].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0(2): 39-42.
- [2] 吴立昌. 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7.
- [3]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心理学经典三部曲[M]. 那振铃, 周丽, 李伟霞, 译.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9.
- [4] 三岛由纪夫. 金阁寺[M]. 陈德文,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他者即自我——论《金阁寺》中鹤川、柏木对沟口的自我投射

摘要: 《金阁寺》中鹤川与柏木的角色于主角沟口有特殊意义，是弗洛伊德“三我”结构、投射机制的例证——前者是沟口对善、平等与道德理想的超我投射，后者则是其对恶与本能欲望的本我投射，二者并非独立他者，而是沟口分裂人格的镜像。从依赖超我进行“善的表演”，到主动与本我结盟、接纳本能欲望，再到鹤川之死的超我崩塌，沟口的精神轨迹揭示了个体在道德与欲望撕裂中的精神困境，彰显了日本文学中精神分析表达的深刻性。

关键词: 他者，自我投射，金阁寺，精神分析